

爛賬·冤債

王立文回憶錄

新聞女兵婦運先鋒

安徽省宿縣是我的故鄉，我在南京滙文女子中學畢業後，於民國十四年多乘輪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留俄回國後即任上海勤業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安徽元老柏文蔚烈武先生是女師學校的董事長，校址在上海法租界西愛咸斯路，校園環境優美，學生壹仟陸佰多人，我承開國先進的推愛，對作育英才培養幼苗，很感興趣，尤且感到很有意義。

後來監察院于院長右任先生約赴南京，任南京民族通訊社記者，專職採訪外交部及俄國大使館一切消息及所有新聞。曾因汪精衛遇刺案被禁閉兩週，查明無罪釋放後始得恢復自由。擔任記者同時主編新婦女月刊，為婦女運動而努力工作。又任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常務理事、南京第一托兒所所長，這些都是當時的新興事業，創始艱難，經費不足，在玄武門內大樹根旁建立一所收容三百個孩子的托兒所，全部電器化，清潔整齊；幸得南京市政府支持，順利推動工作。直到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五日機轟炸南京，不得已通知

各家長分別領回，最後剩下八名兒童，均七、八個月大，無人來領，不得已帶回我們自己的家鄉，分別雇奶媽收養；一件社會事業，千辛萬苦，尚且不易成功。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那時在南京的一般婦運的工作者，差不多都參加這個研究會，組織分為學術研究、文藝、宣傳、總務各組，人才濟濟，經常集會，盛極一時。抗戰發生，大家忙於救亡工作便不再注意學術研究會這個組織了。

勞軍救難辛勤耕耘

先是民國廿五年五月五日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廿六年五月公布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旋即在首都南京成立全國婦女競選國民大會代表聯合會，筆者當選為常務委員，當時各地婦女界為婦女名額問題，紛紛開會要求，首都為領導地位，由十餘個婦女團體發起組織全國婦女競選委員會，集全市婦女界參加，一方面選出代表，一方面請求執政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明白規定婦女代表名額佔百分之廿。經過多次集會討論，直到各地代表產生。

民國廿六年抗戰爆發，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總會應時產生，筆者當選為總會委員，兼南京分會常務委員，對慰勞品之徵募分發與運送，努力發動，工作不分晝夜，分會四十多處，支會五十多處，工作人員非常忙碌，對慰勞工作全力以赴，貢獻良多。

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我曾參加前線搶救難童工作，任六安保育院長，兩個月的時間搶救難童四千餘名，在日本飛機轟炸之下，不顧自己的生死，但要顧到難童的安全，六安撤退，路過葉家集，大雨傾盆，大家睡在一所小學的課室內，滿鋪稻草，吃青菜飯過了一週，停雨後才搭車到信陽，轉抵漢口，難童全部交給保育總會，我自己大病一個月。

捐木抗敵血本無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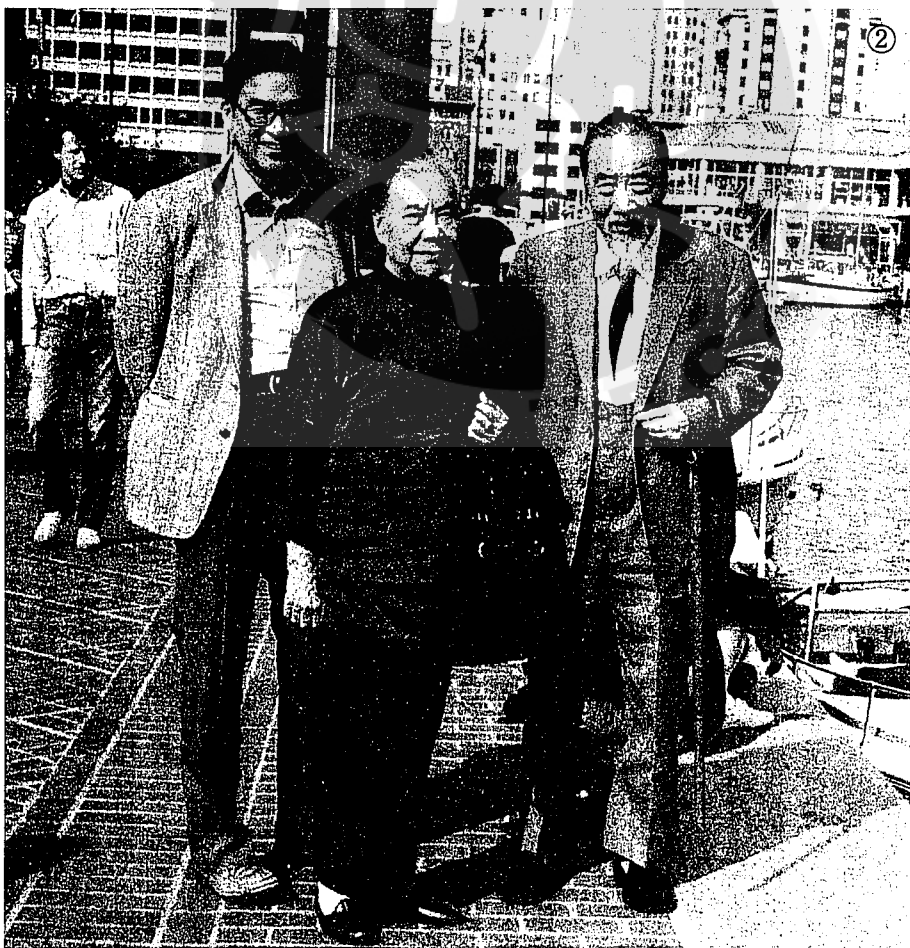
嗣後我又奉派出任全國救災會委員，賑濟委員會廣西全州總站及桂林救濟總站主任，兼貸款處主任，以桂林為起點，南至南寧，東至梧州，西至柳州、宜山、河池、南丹、六寨等地，共九十九個分站，由行政院戰時服務團團員，負責工



①

① 王立文女士在書房內留影。

② 王立文女士偕夫婿劉行之監察委員與公子合影。



②

作，抗戰八年中總計救濟過境難民及香港撤退僑民，一千六百八十多萬人，港僑田漢、安娥等文化界人士過境，賑委會電令，發給特別救濟費每人伍萬元，田漢先生有詩云：

「空有新詩不療貧，桂林珠米桂如薪，殺人無力求人懶，千古傷心文化人。」

賑濟委員會曾設法備交通工具送他前赴貴陽

轉任重慶。普通難民先行登記，預先建造房屋，供他們居住，再發食米及費用，維持生活，然後按照原來職業，分別組織工廠，資助貸款，自行謀生，先後組設捲煙廠、營造廠、墾殖廠、工藝廠、米廠與書店、報館及學校，難童教養院以及桂林木廠等，十多個單位，各單位工作人員都是股東，大家都能刻苦耐勞，勤奮努力上進，業務蒸蒸日上，自給自足，都有很好的規模。六百多名原來經營木業難民都是股東，自組木廠，經營業務，人事管理，皆由難民自行推選經理負責。總站主任兼任廠長，輔導難民，就業工作，一切對外借款經費支援，純由廠長負責辦理。民國三十三年六、七月間，湘桂緊急，桂林城防司令韋雲淞將軍，會同桂林市長陳恩元及即將就任新職市長蘇新民，三人親自來到木廠，商量動用桂林木廠，最大木料，長三丈，直徑三尺，總計需用三千棵作為城防工事之用。當時桂林木廠僅有二三一六根合乎標準，價值五千六百萬元，韋雲淞司令先付三十四萬元，並說明上級款到，立即一次付清。當時激於殺敵愛國心切，慨然允許，並另捐助城防工事費用二千萬元，全部股東員工一致同意，成全大我，犧牲小我。城防司令韋雲淞

特別報請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頒發特別嘉獎親筆函謝桂林木廠的義舉。新舊任市長陳恩元、蘇新民，都追隨政府來到臺灣，陳恩元任監察委員，蘇新民任國大代表，均有親筆函件作證明。當時憲兵司令王澤民後任立法委員，警察局長馬啓邦後任國大代表，均有信件給國防部證明此事確屬實在，所代管款應立即發還。

一筆爛賬一拖再欠

在桂林城防工事剛剛做好，款項尚未發下，不料在九月中旬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將軍下令焦土抗戰，桂林東西北門皆放大火燒城，僅留南門供民衆逃難。當時幸有紅十字會借給救濟總站四輛衛生列車，供我們及難民等逃生之用；九月十三日我們都上了衛生列車，車中人滿，車上車下都是婦孺，一則舊車搭載過重，再則煤不夠用燒木料，遇上高坡，汽車發動不了，大家都得下來推車。汽車走走停停，走了兩個多月，才到柳州，然後又到宜山過中秋；慢慢的經過河池、南丹、六寨等地，一路上遭週日機轟炸，九死一生。冒千辛，歷萬苦到了獨山，衛生列車全部不能用了，公用車全都沒有了，幸好六百六十多名難民，自動編組成隊伍，在民間找到了六部板車保護我們全家，前拉後推，板車推向貴陽。我仍在路上走了五個多月，在大雪紛飛中，接近舊曆年才到貴陽。接許代委員長世英老先生命令，派我擔任四川綦江難民總站主任，主持難民救濟工作，又兼任重慶南岸海棠溪總站主任，主持安置難民善後工作。從綦江到海棠溪，很遠的路程，很多

分站，往返勞頓，艱苦備嘗。總計抗戰期間，我做了四個難民救濟總站主任，兩個貸款處主任，捲煙廠廠長，桂林木廠廠長，墾工廠廠長，米廠廠長，很慚愧我不曾進過難民救濟學校，幸好遇到問題來了，當機立斷，合情合理，解決問題，該怎樣做，就怎樣做，承蒙行政院頒發獎狀五十多件，帶領行政院戰時服務團團員二千多人工作，確非易事。

我到重慶，接桂林城防司令韋雲淞先生函告，桂林木廠欠款，發款時找不到我們，餘款壹千壹百貳拾萬元正，由中央銀行滙交軍政部陳誠部長代管，你們到了重慶即去領款，不會有誤。我們在重慶，憑信前去領款，陳誠部長面告，款已到部，首期款壹千壹百貳拾萬元，文件尚未到齊，等一兩個星期，文件到齊即日發款；我們只好等了。

誰知一等再等，等了半年多，抗戰勝利了，大家回南京，一片凱旋喜悅之情，無法形容，再去找陳部長，陳部長說勝利了，到南京給錢。我們回到南京，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廣西銀行在南京復業，原來桂林木廠在桂林借廣西銀行二十萬元，經過一段時間，我還廣西銀行伍拾柒萬陸仟肆佰元，加一倍多的還款，以維持信用。然而國防部代管的款項，竟推說從重慶回南京，文件太多，一時找不出來，正在催辦中，找出文件立即發款。

後生小子一欺再詎

我們只是無可奈何的等待，國防部從來未說



①五十年前的民族通訊社記者兼新民報社新婦主編王立文女士的
照片。

②王立文女士早年偕夫婿監察委員劉行之訪問草山農家合影留念。



不給錢但始終未給錢。時間飛快，勝利不久，我被推選為制憲代表，奉領勝利勳章，民國三十五年參加制憲大會，三十六年全國大選，當選行憲國大代表，三十七年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中國統一憲政開始。

三十八年隨政府由京飛上海，由上海轉往廣州，由廣州轉重慶，由重慶轉成都，又從成都經香港轉來臺灣，長途奔馳，艱難險阻，一言難盡。桂林木廠原來股東員工，共有二百多人，不甘被奴役，衝破鐵幕，逃來臺灣，計有王麗如、馬方福生、夏音齊、劉廣平、周玉清、張幼琴等人，他們都以爲國防部代管款發下了，來到臺灣不愁生活；那知道我在廣東，找過閩錫山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秦副部長德純，兩位都說國防部經費困難；暫發銀元券兩仟元救急，不久都可以發下，但是兵荒馬亂始終未發下。

桂林木廠股東員工，有的經由香港，經廣州，或經舟山等地先後逃來臺灣，到了臺灣第一要事是住的問題，這要感謝臺中縣長于國楨學長（他和我在莫斯科中大同學）把鄭成功祠堂借給我們，暫避風雨，然後又幫助我解決許多困難，如臨時救濟，給米給柴，介紹職業，能做工的做工，能教書的教書，這一來解決了一大半人的生活，剩下的老幼婦孺，我也要養活他們。我只告訴他們說我有飯吃，你們就有飯吃，別的都不必多說，說了也沒有用。從那時候起，鐵肩擔道義，在臺北東挪西借，養活他們；可以說從三十八年起，到五十八年，這二十年中，天天借債過日子。

一面還向國防部要求發還代管款，那個四層樓可不容易上，臺階又滑又抖，一不小心，就會跌下來，幸而那時候我還年輕，前後上過四十六次，誰也不負責任，你推他拖，幸而遇到一位副部長梁序昭先生，叫他的參謀，跟我算賬，他說：「趕快算清，該多少還多少，代管的款只有她這一筆，別人不能援例，不還清人家，國防部站不住脚的，不能收到人家的錢就賴了賬！」梁序昭又派了政治部副主任楊維智與參謀魏奇，跟我一齊算賬，可是他們兩位白天公忙沒有空，叫我每天晚上到光復南路二號楊維智官邸去算賬，我請了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委員余拯作見證人，每天我從北投到武昌街一段十八號接余拯委員一同去光復南路二號楊府算賬，算來算去，算了四年沒有結果，得不出結論。

按木料算，我們的木料價值經林務局核算，應值八千多萬元台幣，他們嫌多又叫我們去中央銀行按金價計算，算時應合金價四萬八千多兩，他們又不願意；又叫我們去糧食局按米價折算，當時米價不貴，數目更大，他們又不願意。從四十八年，算到五十二年七月，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折扣，如何算法，由國防部報請行政院核定，發給五十萬元了案，還要去法院公證；不願意，五十萬也不給了，這是國防部的辦法，無可奈何，忍氣吞聲。

子女有成還清冤債

我找了端木愷大律師，證件齊全，不服氣打官司吧！端木愷律師說：「這官司一定勝訴，但

是不能打；這官司你請一位律師要自己出錢，他們十個律師都是公家的錢，民不與官鬪，官司打勝了，他們如果要賴，既不能查封他們的房子，也不能拍賣他們的房子，不能打官司，先拿了五十萬再說，慢慢的磨吧。」收了這五十萬元，又借了土地銀行二十四萬元，才把木廠員工及股東們的錢一一還清。

民國五十二年七月以後，轉過頭來還要付借款的利息，借錢那有不付利息的，三分利，慢一天比員工股東們要吃飯還要利害，鐵青的臉，今天沒有就不行。我們全家收入都用來付利息還不夠，再變賣什物用來付息，一直苦挨到六十年代。兩個兒子都完成了學業，獲得了博士學位，有了正當的職業，有資格向美國銀行借錢了，常常的一開始叁百元、伍百元匯來，以後叁千元、伍千元匯來，匯來的款不下幾十次，有信件有銀行匯款單可憑，那時候美金一比四十六元，很有用處，才還清了這些冤債。

誰欠誰債自有公論

土地銀行借了二十四萬元，替國防部還了債，救濟了一部份木廠員工及股東的生活，人事局主辦人員都是形式上的守法主義，借了錢就不給房子，不管你的錢是怎麼用的，所以我們沒有房子。民國四十七年租了臺銀一塊保安林地，租約寫的是一二八坪，租金是四十二元五角。開山是我們的錢，整建土地是我們的錢，建築房屋是我們的錢，裝修自來水及溫泉設備，裝電燈及電話都是我們自己用的錢；三十多年來滿院花木桂樹

中、茶花都成了大樹了，另外椰子、柳子、木瓜樹外多棵，一根鐵絲，一根釘子都是我們出的錢，整建費、修理費、保養費花了不下三千六〇〇多萬元。臺銀只知道地賣了，租金也賣了，租金單一大堆要我們繳納。但對我們用去的建屋開山整地的大筆錢，一字不提。行政機關也好，銀行也好，各為己甚，為民服務，為民造福都是空口說白

話，從來沒有為人民想想。這是我自己親身體驗的，我們這塊房地用掉的整建費，這又是冤枉債；將來如何結案，如何處理，不得而知；我們人也老了，無力也無能，更沒有精神，去煩心了。我們在臺灣四十年，除了吃大虧，多忍讓；我們的損失無法計算。從好的地方說，心田種德心常泰，平安喜慶總相連。良心平安對得起天地

鬼神，現在我們每天上山下山要走九十層台階，上下一百八十層，我們還能走動，上山不易下山難，辛苦老人莫怨天。八十多歲的老人，總是不容易吧，托天之福，我們都還走的很好，只有說感謝上蒼保佑。

愛因司坦說：成功的人收入多，付出的少；有價值的人收入少，付出的多。



①作者王立文女士（左）與夫婿監察委員劉行之（右）合影。

②王立文的公子，馬里蘭大學物理系主任劉全生教授。

